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在一起討論問題了，剛才姚文元同志說了，我們最近到北京去了。我們是十二號去的，是毛主席要我們去的，現在街上有一張大字報，大字報講張春橋為什麼又要到北京去了？現在我可以回答他是毛主席要我們去的。我們十二號到了北京以後，毛主席當天很快就接見了我們，後來主席又召集了中央的會議，討論了上海的工作和其他的問題，在我們離開以前，毛主席又接見了我們。剛才姚文元同志已經說了，我們首先應該匯報的是主席的身體非常非常的健康。我們每一次談話的時間都是很長的，主席的精神非常旺盛，始終都很愉快。每一次談話對於上海的情況都非常熟悉。好多問題上海的情況只要我們提一句他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講一些地方的情況，非常關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們在北京一個星期，每天都感覺到這一點。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總理、中央軍委同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黨中央負責方面的同志對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關心，使得我們非常感動。我們知道，我們兩個人被主席在短短的時間內一再的接見我們，這不只是對我們兩個人來說，我們感到是光榮的。我們知道，我們是代表着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去的。我們是代表在坐的同志去向毛主席匯報的（拍手，高呼口號），毛主席對於上海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取得的成就給了很高的評價，對這些同志們都會知道的。過去已經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的奪權和上海各革命組織發出來的《告全市人民書》和《緊急通告》，……毛主席很快的就看了，很快就決定向全國廣播。在這一次的談話裡面，毛主席又說：“上海的工作總的方面是很好的。”他就講了一些這一段的歷史，比如說：上海的工人在安亭事件那個時候，他講：“在上一次你去的時候，不是只

有一、二千人嗎？那么現在已到了一百万多人了，工人組織起来就有一百万了。这就說明上海的工人群众发动的比較充分。”毛主席对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問了我们，学生的情况，农民的情况，机关干部的情况都問了。机关里的情况，甚至还問了一些市委的一些干部的情况。我们都汇报了。他还問到比如象一些细节他都曉得的，比如說：你们那个时候一些学生不是都到了碼頭嗎？現在这些学生是不是还在碼頭上？我们一一告訴，……当我们陪卡博同志到碼頭去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学生还在那里。主席說：“很好！”他对学生的关心，对工人、对农民、对机关干部，对解放军干部都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对上海革命群众的每一个好的創造，每一个革命行动，无微不至的关怀、了介，我们感觉到主席对上海的关心，这这对我们上海革命造反派來說，对上海的革命群众來說，是对我们上海人民的最大关怀，也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最大的支持。（鼓掌，高呼口号）有了毛主席的支持，有了党中央的支持，我们面前不管有了多大的困难，不管阶级敌人玩弄多少花样来反对我们，他们都没有办法来阻擋我们上海的革命群众，在党的領導之下，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去夺取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我想下面分別說几个問題

第一个問題讲一些夺权問題，因为这个问题在主席那里談的比較多，这个问题我也想談得多一些。我们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是从上海革命群众夺权开始的。这是我們現在大家所讲的“一月革命”的风暴，（高呼口号）我们大家都知道，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說，也是解决政权問題。但是，我们这一次的夺权，夺取政权和一九四九年不同，那时，我们是从国民党那里夺取政权，这次是不同了，有他不同的方面。毛主席在这次和我们談話里說了

这一場革命，現在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同志们：注意主席这一句話，他說：“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发动的。”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是毛主席自己亲自領導的。那天，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讲：“考虑一下，写一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論問題，对这一句話，我想根据我们的理解，在这里解釋一下，在我们的理解，这一次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就是說，我们十七年来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权。十七年来从根本上說，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占統治地位。昨天紅旗杂志第四期社論說到的意思。不是刘、邓路綫占統治地位。十七年来，我们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那末，这个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綫的。这个不能說十七年来我们的政权是资产阶级政权，或者說刘、邓路綫占統治地位，那不能作这样的估計。对于毛主席这一句話，简单地說来，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是肯定的，那么后面这一句話呢，就是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怎么又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毛主席說，那天对于这个问题，他介釋了，他說：“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中間有一部分被篡夺了，这一部分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革命。”所以，同志们，毛主席这句話是辯证法的，他先肯定了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說还要革命。为什么要革命呢？因为我们这个专政中間有一部分不是全部，是资产阶级的，被篡夺了，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么一小撮人篡夺了，所以才需要革命。（高呼口号）有一个地方，有的地方提出一个口号“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是一个反动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所謂彻底改善实际上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彻底改善就是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行了，要彻底改了吗？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的改善。”这是讲，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这个问题，为什么又说对于这个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呢？事实是如此，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是毛主席自己发动的。为什么要自己发动这场革命？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统一了十七年，这十七年来比较稳定，大家都很满意。觉得我们的十七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这十七年前，中国至少一百多年没有统一了，四分五裂，很不稳定。那么现在呢？经过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国家稳定、统一了。稳定，而事情总是这样，统一、稳定，有他好的方面，但是，他也暴露了问题，就是在这些比较稳定中间，实际上也不稳定，而且有一部分政权、党权、财权、文权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毛主席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正是为了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我们这个专政更加巩固，能够把修正主义根子挖掉，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的祖国不会变颜色。我们感觉到毛主席提出这一个思想，这是个重大问题。这整个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从这句话来看，主席常常是这样，从很复杂的事物，最后就变成一句话。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能够启发我们去想各种问题，我们正确的认识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夺权斗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认识这句话，我们就看不到发动这一场革命的重要性，也看不到这场斗争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很好的懂得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那我们呢？就能够正确的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事。（高呼口号），这是夺权问题中我想谈的第一点。

第二，在夺权斗争里面所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作为问题的中心是夺权，是能不能夺权，夺了权后，

能不能巩固的关键。（高呼口号）我们大家还记得，在我们上海，上海旧市委，旧市人委的权已经被夺过好几次了，一月十四日上海市二兵团他们夺了一次，发了通令。一月二十二日上三司还有其他的四个单位又夺了一次。一月二十四日红革会和其他单位又夺了一次。但是，他们夺到了什么东西呢？他们夺到了几间房子。有的就把市委呀，还有什么华东局大印抢到手意味着印抢到手就算权夺到了。而实权呢？根本没有夺到，你们在坐的同志根本不知道。他夺权后，他应该发号施令了，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他的权说是夺了，可他说的话也没人听。（口号）市委的权是这样，华东局的权也是这样，我这里讲的是华东局机关，也夺了好几次了，到现在为止，权夺了没有呀？占了几间房子。有些人强迫魏文伯、韩哲一签个字，要些东西，搞个汽车什么的。这些东西大约夺了一些。别的东西夺不到。还有我们在上海工作，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夺了对上海有影响。我们现在劝夺华东局权的人还是那个权不要夺了吧；要夺，就要搞三结合，一定要三结合。这个问题，我将来专门和他们谈。在中央讨论了一下，华东局的权不能这样的夺法，因为华东局书记处的权是不能这样夺的，因为华东局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夺权就是向党中央夺权。你们要夺，只能夺华东局机关。华东局机关只是一些房子，有什么好夺呢？在这里，我只是谈了一个市委和华东局机关，其他的单位，你们知道比我了解得多。有许多局，有些县有些区域工厂夺来夺去，结果，谁也没有夺下来。这里说明了什么问题呢？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是夺不了权的。没有一个大联合，只有几个单位，一个单位，两个单位或者几个单位去夺权是夺不下来的。那种夺权，那种小联合的夺权或者一个和两个单位的夺权，那只能产生小团体主义。我们这里也有，某些单位夺权，夺了些什么？夺了一个印刷厂。夺了一个印刷厂后就归这个单位了。

别的单位来印就不肯了。那种小团体的夺权，实际上是把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所有制。这是破坏社会主义的。我们的每一个工厂、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不是任何团体和个人的。怎么能属于一个小团体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变成小团体主义。这样，全民所有制变成小团体主义，这实际上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制度，是南斯拉夫的办法。（口号）我们这个话说得尖锐一些，是为了告诉这些同志，这条路是不能走的，是南斯拉夫的办法，什么工人自治呀，小团体呀，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否都懂了大联合夺权。对于大联合夺权，还不能说完全，只是概念。还不是说得很清楚，要实现大联合，它的关键，那就是形式，要找一个恰当的形式，这个恰当的形式，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三结合。三结合现在同志们都知道，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人民解放军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这三者缺一不可就不能算大联合。所谓大联合并不是说有多少个团体都参加。当然应该凡是革命组织应该联合。这个思想我们已经宣传了很久了。现在的问题是群众组织越多越好，而是说如果缺少了另外两方，只有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人民解放军，没有领导干部，那么，这个权是夺不过来的，夺过来也不巩固。对于主席的这次谈话，谈得最多的是三结合问题。我们很好的思索了主席这个指示，考虑了，想了这些问题，和一些同志交谈了意见。在北京最近碰到山西、山东的同志都到中央文革汇报工作，山西同志汇报的那天我参加了，山东的同志汇报的那天我们就回来了，没有参加。从各个方面来看，山西的夺权，军队的作用特别明显。山西的夺权如果没有人民解放军，那个夺权就根本夺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山西省委反动透顶，而且已经准备了武装，搞了一批便衣特务，发了枪。刘恪平同志，他们的领导干部，原来的付省长，就在他住的房子对面，就

有两个特务，有枪，枪口就对着他的门口，随时准备把刘恪平同志捉起来。如果他们不夺权，再过两天，这一批领导群众的革命领导干部都要被捉起来。是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革命派一边，支持革命派的夺权。这样，手里一枝枪也没有的革命群众才把权夺下来。

刚才我们语录不是念了主席的话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军队的政权，在世界上，在阶级社会里面都是不存在的。要想夺权，没有军队那怎么可能。我们夺国民党的权要有军队，要靠军队打天下。今天呢？我们把一部分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夺过来，还要靠我们人民解放军来支持，没有这个力量是不行的。

没有革命的领导干部行不行？也是不行的。因为群众要采取革命行动。比如说吧，我们革命造反派建立一个战斗队，这个战斗队总要有一个负责人。不管你名字叫什么，有的叫服务组，有的叫勤务员，有的人不喜欢这个“长”字，但一个战斗组不管叫什么，都要有一个领导人，总要有一个干部。我们现在夺权总要有干部，无非是新的干部、老的干部。有新的，过去没有担任领导工作的，为什么要有一批担任过领导工作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呢？因为事情很明显地摆在这儿，一个工人同志，他不管多么好，革命积极性非常高，也很有工作能力，在文化大革命里也有很多的贡献。但是马上到一个省市，比如说上海市，或者一个省，江苏省交给这样一些工人同志来管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没有经验嘛。他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他管一个车间他还可能比较熟悉。管一个大的工厂就困难了，如果把上海市统统交给他，当然困难不是更大了吗？这个道理用不着解释。比如说现在好多工人造反派、工人造反队的同志们，你们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同志很有才能，现在马上交给你们，你们也困难。

現在就是象我吧，我总算工作做了一些年了，現在已經是要我負責上海市的工作，全市的工作，我也是感到非常吃力。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事情我过去没什么管过，我这个心里并不是那么宽。現在呢？那么一大堆的問題摆在我的面前，过去有的时候，我也頂多参加一些討論吧，而决定不是我决定的，很多事情我根本没有碰过，沒有摸过。經濟工作，工厂工作，我知道的很少，商业知道一点也不多，像財政稅收这些事，我参加工作以来，我可以在这里很坦率的向同志们讲，我从来没有兴趣，过去文件送到我跟前，我根本不想看。好多事，农村我知道一些，也不多。本来嘛，这种感觉，比如說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总感得虽然我们也負着很重的責任，跟我们的能力不相称，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觉得好办，但到最后，問題不好办，好去找柯老去商量一下，他下个决心就去办了。至于柯庆施同志一病倒，六四年病倒，六五年一去世，我们就突然的感到这个肩上的担子就挑不动了，那个担子突然往身上一加，我们感觉到没有一个地方商量，担子一加挑不动，何况現在面临着的任务比那个时候我们要管的事情多了。那么一个普通的工人同志，学生他们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更多。在主席那里談到，我们一个大学生有的还刚刚毕业，有的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要管一个上海市是难的，主席那天就說，叫他当个大学校长也不行，当个大学校长，那学校很复杂，你是在一个学校里刚刚毕业，还没有毕业的学生，学校的情况又不了介，主席曾經讲，照我看，当个系主任也不行，当个系主任要有学問，他总要有的学問吧。你这个学問还没有讀完，或者大学刚刚毕业，学問还不够，而且沒有教书的經驗，沒有管理一个系的經驗。要搞个系主任嘛，总是我們已經培养了一些助教、讲师，就是說原来的領导干部，所以总要这些人出来。那

天我讲了，主席也讲到有些老的人，不可能都不要，当然囉，他也說周谷城恐怕不行了吧？周谷城如果再教书也不行了吧。那一些人还行呢？主席关心这些事，我說了这些话，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你们不要洩气，主席是說青年同志很有希望。在这次文化大革命里面，他们做了很大的貢獻。但是現在呢？马上就要接这个班，按省委書記、市委書記这个班有些困难，要有一个过程，还得学习。

三結合呢？我的理解也是帮助青年同志学习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老是規定的考虑这个問題，怎样才能培养接班人呢？这个班子怎样接呢？看起来三結合不但是夺权的一种形式，而且是老的带新的一种形式，大家在一块工作嘛，学个几年、七年、八年……这就不能不說三結合的必要性，这就不能不說到我们的青年同志，学生同志马上接这个班还是很困难的。拿我們現在的情况来看，我們上海的革命群众組織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个刚刚我已談到了，主席給了很高的評价。但是，我們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的人民公社，有一些人在剛成立的时候，不是实行三結合，那我看人民公社那块牌子早就叫人家砸掉了。你能說沒有这个危險嗎？有这个危險的。因为第二个人民公社，第三个人民公社已經在筹备了，他要砸掉这块牌子，連在外滩人民公社办公的那个地方警卫員的同志他们都向警备区的首长請示：說这块牌子要有人来砸怎么办？因为互相砸来砸去嘛，砸了这块牌子怎么办？警备区首长下了一个坚决的命令，誰要砸这块牌子，当然是反革命，捉起来。如果没有人民解放軍参加公社的三結合，那么我不是在这里过高的估計了我和姚文元同志的力量，我们两个人没什么，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工作的，有这么一点身份，我们参加了工作。結果也使得有些人要反对人民公社不能不考虑一下，所以如果……从这一点也

可以看出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去夺市委的权，市人委的权就夺不下来？为什么我们三结合就把这个权夺下来了呢？就是因为三结合。如果不是这样的三结合，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今后也是这样，有些三结合的。我下边要讲，这个三结合也会具体的加以充实，加以提高。这个市的革命委员会，他就更加巩固。谁要反对这样的组织，那就不但是使得革命组织来反对他，咱们的人民解放军也会起来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这样临时的权力机关，他就可以形成有威信的有权威的，会更加有力量。可以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这个机构是有权威的，在将来会更加有权威，更加有力量。有些人总想试一试，想个反对物，过去想反对人民公社，现在想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那么就请他试一试吧，我们也准备好了，谁要想来碰一碰，我们就会懂得怎样对付他们，（鼓掌，高呼口号）这是谈的第二点，必须实行三结合，这是主席给我们反复谈的一个问题。先讲了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那么要搞这个革命就要大联合，大联合的最好形式就是三结合，我们现在的問題就是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我们现在应该在市一级扩大这个三结合，同时在以后，各个夺权单位，需要夺权的地方，在夺权的时候我们都要实行三结合。有没有可能实现这个三结合呢？上海市有六百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处长以上的干部有六千多个。难道说，我们从六千多个、六百多个人中间都找不出三结合的对象吗？这个不可能，可以找到，而且应该说这六千多个人我是讲处长，还没有讲到科长，科长就更多了，这么多人里面，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这一点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当然，上海的革命干部，或者说这整个的革命干部造反的比较少，而且造反比较晚，上海机关干部造反一直到十二月十八日开大会

才算开了炮，这样子就相当晚了，但在全国还算是好的呢！还是比较先进的。当时毛主席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上海的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了。”但是整个的数量来说不是很多，十二月十八日起来造反的干部中间，还是一般干部比较多，市委书记一个造反的也没有，付市长一个造反也没有，这个事情当然不能怪革命造反派，这个不能怪革命群众，这个应该由他们负责，谁让他们不造反？这个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替他们负责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首先应该是陈丕显、曹荻秋负责，他们对干部是欠了债的。他们自己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一大批干部带坏了，总是有为首的嘛。同时，据我们知道，中央的很多指示在上海没有很好的向干部传达，不但在坐的很多同志，很多的一般群众，或者一般的干部没有传达，包括一些中层以上的干部，甚至于市委里面的一些人也没有传达。这样就使得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不能够传达到群众和传达到干部中去。十一中全会回来以后传达了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很好传达。据说市委的会，开常委会，还是委员会？曹荻秋传达了一个小时，那怎么行呢？那个样子传达些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他们也没有很好传达。据我们听说象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根本没有很好的告诉群众，没有很好的告诉干部。当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冲的时候，一提炮打司令部的时候，上海的一些干部都莫名其妙，什么炮打司令部？所以有很多情况应该由领导负责，应该由为首的人负责。有一些事情他们根本没有传达，比如同志们知道的安亭事件那个事情，而他们传达谁的指示呢？传达陶铸的指示，曹荻秋就是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就给他说了一通，那种口气，春桥嘛，既然已经承认了嘛，那就只好这样子了，再继续做工作嘛，再把它改过来吧，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曹荻秋就是根据这个来办事

的，他就执行陶铸的，对陈伯达同志的意见我也说了，主席的意见我都告诉了市委，市委不但没有向一般干部传达，连市委书记处也没有传达，连马天水都不知道嘛！马天水所以到工交会议上放炮，那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错误。但是呢？我在北京谈话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不知道主席的意思，不知道！所以他才敢于在中央的会议上继续来攻击我。他如果知道主席的意思，我想这个人他没有这样大的胆量。他又是不知，而陈丕显、曹获秋这些人就在那里鼓动他说：你到北京去好好的讲，什么话都讲，什么话都讲。这样子鼓动他，这种人，同志们，也可以看一看吧，因为陈丕显、曹获秋这样的人，他们欠债实在是欠得多了，不但对上海的人民欠了债，而且对干部欠了债，对周围的同志也欠了债。同时，他们又用什么内外有别，要组织纪律呀，他们的什么东西也不能讲。所以，干部统统压在里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许多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我前边讲了，首先由他们负责，但是领导应该首先负责。这个不能怪我们，不能怪革命的群众。我们相信他们中间，这六千多个人，处长以上还有六百多个部、局长以上的干部，我们相信他们的多数是愿意革命的，是愿意跟着毛主席走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问题，同志们，为什么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还是这些干部，那为什么在柯老领导之下，就能够执行主席的路线，就能够紧紧地跟着毛主席，把上海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柯庆施同志主持工作这段时期，在五八、五九年以后这段时期，上海的工作在全国是比较好的，还不是这些干部，这还不是六千多个领导干部，还不是这六百多个部、局长？我不否认他们中间有一小撮坏人，但是我是讲多数，现在这些同志那时他们在柯老领导之下，他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刚才噫语

景不是要说主席的指示：“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那么，我们也应该看一看这些干部十七年来的表现，可以加以对照，这些干部那个时候在柯庆施同志在世的时候，他们执行了主席的路线，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他们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不是铁板一块，不是一个样，我们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毛主席这一次和我们谈话的时候，又一次对我们讲，我们应该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会跟着我们走的。这里讲的我们是指跟着毛主席走的。毛主席他说：“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相当多，中农数量很大，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包括一些小业主，这些数量相当大。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善于引导，他们也会跟着我们走的，主席在任何时候他都是一再地强调，我们要相信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不相信大多数，就是不相信大多数人是革命的，结果使得最后自己完全孤立起来，那末要实行三结合，最重要的是对待干部问题。红旗杂志第三期的社论，里面有一段是专门讲了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第四期专门写了一篇，正确的对待干部问题，这两篇社论党中央都讨论过的，毛主席看过，头一篇主席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正确对待干部这一篇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问，我们只知道我们走的那天当面送给主席了，他看了，我说的重要修改，比如说象这样的话，红旗第三期，现在大家经常从报纸上看到的一句话，比如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正，鼓励他们立功赎罪，比如这句话后边几个字，是主席加的，原来是说：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要允许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主席又加上，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边又加上“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这样就体现了主席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就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如果他呢？不坚持错误或者他不是屡教不改的，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他前文是这样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就是说我们刚才语录也讲到不是不可救药的人都要治病救人，主席加这么几个字，政策界线就很清楚了，就要宽得多了，现在同志们，你们我是已经在别的会议上说过了，好多同志最近比较忙，特别是夺权以后，记说夺权以前学毛主席著作还好，说是有时间，夺权以后啊，那个忙的一塌糊涂，不看书不看报，这个危险啊！象这样两篇社论和中央最近发的很多文件那是需要逐字逐句地考虑的啊！因为里边常常是一两字的改变是政策上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革命在发展，在变化，形势在变化，如果我们的头脑不适合于这个形势的变化，我们就可能犯错误，在这次谈话时候毛主席反复讲了“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问题，“打倒一切，怀疑一切”这个口号相当普遍，相当流行，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反动的。这一种思想，在我们革命造反派内部有影响，这种思想不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思想，但影响了我们影响了我们一部分同志，因为这是我们的理解，在文化大革命里边，看到那些人，那个顽固劲啊，就发生一种错觉，认为到处都是坏的，因此呢？当别人在宣传“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有理。其实啊同志们这个口号我们只要想一想就根本不能成立，你说打倒一切？那么提口号的人他自己就不打倒自己，他怎么打倒一切呢？他还是不打倒一切，他还是打倒一部分，他“怀疑一切”，他真的“怀疑一切”吗？他就不怀疑他自己，他也不怀疑他这个口号对不对？你也应该首先怀疑怀疑我这个“怀疑一切”对不对啊？他也不怀疑的，实际他也是怀疑一部分，实际没有那样的事，“打倒一切，

怀疑一切”的。只能是这个阶级两个阶级的对垒，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打倒无产阶级。那里能够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那是内部发生了矛盾，这一种口号今天阻碍着我们的解决，特别阻碍着我们的三结合，如果这个问题不能从思想真正解决，三结合搞不起来的，因为你看看这个人要怀疑，那个人要怀疑，这个人要打倒，那个人要打倒，你还有什么办法三结合呢？这样要“打倒一切”的人“怀疑一切”的人，最后，势必也被人家怀疑，被别人打倒，你总是走向反面，这一点毛主席说的非常确切，也是一定走向反面，一定被人家打倒，干不了几天。因为他直接研究了一个单位那是中央机关有个单位，那个单位啊，我们给他讲，我们一到上海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们一和那一个造反派谈话，我们一问，你们这个造反派组织怎么样？他说我们这个造反派很好，我们一个科长都没有，就表示他们这个组织最纯洁了，我们说这个话主席就说，我们这里还有个单位连付科长也不要。有一个单位有30几个付科长也是一个很大的单位了，一个也不要，明明有很多同志很好的，也不要，这个都不作阶级分析了，而是从职务，从单位的职务，从那一级以上，这那里是阶级呢？阶级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当权派有无产阶级当权派，有资产阶级当权派，科长有赞成毛主席的、拥护毛主席的，跟着毛主席走的，有反对毛主席的，应该是这样分嘛。现在有好多不讲阶级的，我们这里一个市一级的，市人委机关什么造反委员会，我们在北京就看到国务院转给我们的材料，他下了一个通令：用电报发给国务院，要取消一切“长”，那你当然嘛，你要提个建议向中央，要取消一切“长”，这个未尝不可，但是，他是给国务院用电报发了个“通令”，而且里面有許多话是完全错误的，说什么，说历来就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

什么，你将来还是处长管科长，你没有办法科长管处长，除非只有把把关系改过来，现在的科长改为处长，现在的处长改名字叫科长，那你有什么意思呢？本来这个象书记，这个在国民党时代是最微小的官职。但是到了我们这就变成了最大的当权派了，这个都是名字问题么，而且里面说什么这个“一切带长字的都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我说这句话是反动的，难道我们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吗？根本没有阶级。从前那个国防部长，彭德怀也叫国防部长，林彪同志也叫国防部长，这是两个阶级嘛，怎么能这样子来搞这一套呢？这个不讲阶级，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搞三结合，一讲阶级呢？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队伍重新来看了，每一个队伍重新来考察，主席说，他说付科长都不要的人，他说这种人搞不了几天的，他说的毫不含糊，他说一脚踢开，最后一定要把自己也踢开，一棍子打倒的这种风气，万万不可长，我们同志们，主席过去一再劝，要读一读鲁迅写的“阿Q正传”，里面有一章叫做“不准革命”，看一看，我们啊，不要不准别人革命，不要学里边那个赵太爷，要允许别人革命，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五个条件之一就要不但要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合作，而且要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合作，还要和那种意见和自己不但不一致，而且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还反对过你，而且证明他是错误的。这种合作，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这是接班人的条件之一。我们的毛主席是这样的模范。我们先来看一看吧，现在把事情都已经揭开了。大字报都上了街了。其实这些事呢，很多事情是党中央过去没有公开就是了。你比如象朱德，朱总司令，这个从井冈山就反对毛主席了，我们现在学习的《古田会议的决议》有好多条就是反对朱德的。朱总司令啊，这里面纠正什么错误倾向？谁代表呢？就是他代表，但是毛主席对这种人是拉着他走的。主席希望多团结一些人，这一点希望我

们革命派的同志们向毛主席学习。我们现在也应该根据主席这种思想和本单位的情况作一些具体的分析，究竟那一些人，是什么情况作阶级分析。同时我们要……（录音不清）但是也不要等一切都成熟了再搞三结合，也不要搞的那么十全十美，也不要搞那样好的干部那可能啊，是不多，我们只能根据不同的人来区别对待，有的人是要打倒的，有的人是要请他参加领导的，有的人是要他参加工作的，有的可以参加一般的领导，有的可以参加核心，或者还有其他的工作，在三结合这个问题上，同志们完全能有创造性，所以要有首创精神，但是目的是要搞三结合，那么有些同志还怕有些人投机是假造反，怕我们认错了人怎么办？同志们不要紧的，不要前怕狼后怕虎的，革命造反派是应该什么都不怕的，怎么现在突然怕起来呢？他投机嘛，投机将来总会暴露的嘛，如果人家一直没有暴露你怎么能说人家是投机呢？如果认错了，认错了将来可以改吗，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吗？这都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造成的结果，这样同志们我们将来不能犯错误了，一犯错误就打倒。我们还是会犯错误的，还是会经常犯错误的，造反派同志也会犯错误的，犯错误咱们就改，早改坚决改，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只要我们符合这一条，我们就不会变成又是反党反社会分子，又是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你只要不做这个就行了，第一不要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其余的你就不怕嘛，你无非不要坚持不改，和不要屡教不改，所以我们即是认错了几个人不要紧，如果我们都这样怕，那么我们将来犯了错误那怎么办？现在我们也不能用着那没人做事情了，所以请各个单位考虑一下排个队，最好先选择几个标兵，某一个人代表那一种类型，有了几个标兵，就好办了，刚才讲的都是对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讲的，我们同时希望大家去向那些干部作工作，我们也希望他们

坚决的站出来。光是我们做工作他们不站出来也不行啊！他们现在也有很多顾虑，说晚了，早没有站出来，你既然承认早没有站出来是不对的，那么你现在还不站出来不是越来越晚了吗？还要到什么時候呢？党和人民是欢迎他们革命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是鲜明的，你们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只要坚决的改，党是欢迎你们的，而且犯了错误也有好处，犯路线错误的，可能因为犯过一些路线错误增加了免疫力，再以后就可以少犯路线错误或者不犯路线错误，也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而现在据我知道呢？双方的感情还有点过不来，有的同志说，这个斗了一场怎么又去和他做工作呢？我说，谁斗的还是谁去做工作好，因为我们是根据毛主席的路线吗？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是毛主席的学生，斗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在搞三结合还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现这一点上，过去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自己首先把感情转过來，他们决不能对革命造反派记仇，准备秋后算账啊！打击报复，那是不允许的，自己挨了些斗吗？如果真正接受了教育，那么就應該更快的觉悟，回到党的路线上面來，回到毛主席路线上面來，那么斗了一下可能有的甚至过分应该谅解，我们对你们，我们执行毛主席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难道说你对革命造反派就不执行这条路线？你要无情打击？那当然不行，小将们有些做得过分的地方，那也只能夠谅解，任何一个革命都要付出代价，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革命，决定中国命运的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样伟大的革命，难道不应该付一些代价吗？我们看我们这个代价并不大，比起资产阶级的革命我们付的代价并不大，法国革命、英国革命、德国革命他们那个反复啊夺权反夺权那个代价大得很，我们这个代价不大，那么自己挨了斗，这也算一种代价，我看有的斗的

完全对，有的斗的有点过分，那么也不过也就那么一点吧！那么算一点代价吧，也算你对革命的贡献好了，老实说如果没有革命小将那样的英勇，那样的敢想敢说，那样的英勇的冲锋陷阵，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是揭不开的。这个功劳谁也抹煞不了，如果没有这样伟大的群众运动，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象有些人我们能够揪得出来吗？能够把上海的面貌象今天这样改变过来吗？不可能的。誰如果看不到主流，看不到主要的方面，那就证明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了解这究竟现在革命是干什么的？我们看到一些人，你们想一想大局吧，想一想这一场伟大的革命，使得我们的国家面貌，我们国家的命运，不是几天而是决定几十年几代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想一想这些自己即便有些不愉快，也应该改过来，看一看大的方面，所以我们现在继续搞三结合，我们希望造反派的同志积极去做工作，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我们希望所有的干部，包括那些领导干部，包括市委书记处的内部的人，如果他们还愿意革命，还愿意跟着毛主席走下去，那我们都准备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来考虑他们的问题，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也希望这些犯了错误有些犯严重错误的人，在这样紧要的时刻，考虑一下自己究竟还愿意不愿意跟毛主席走，还愿意不愿意改正错误，是愿意坚持不改，屡教不改呢？还是准备改？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來，现在是非常重要的时候，不能再拖延了，我们也請他们考虑，这样子我们的三结合，我们的夺权斗争就会更好的进行，这是三结合问题，这是（口号）

下边我想谈一下三结合夺权组织形式问题，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也讲一下上海的人民公社为什么改名字，这个问题毛主席在谈话中间也做了详细的指示，毛主席说，巴黎公社大家都讲搞巴黎公社的新政权吗？毛主席说，巴黎公社是一八九一年成立的到现在

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了而是胜利了，那么据我看现在也一定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允许法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这是巴黎公社。所以有苏联的政权形式，苏维埃这种形式一来，列宁当时很高兴因为这是工农兵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是列宁当时没有料到这种形式，工农兵、资产阶级也都可以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到现在苏维埃由列宁的苏维埃变成了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主席还说，英国呢是君主制，它不是有个皇吗？美国是总统制，但本质上还是一样的，资产阶级专政他还未有很多例子，比如南越是总统制，南越伪政权。他旁边，柬埔寨西哈努克是王国，那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是西哈努克比较好一点。印度是总统制，在旁边的尼泊尔，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那一个好点呢？看起来是王国比较印度好一点。从现在他们的表现来看。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这个秦始皇呢他叫皇帝，三皇五帝他都叫了。太平天国呢，叫天王，唐高宗呢，就是武则天的丈夫他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有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不清）

主席说名称不要改的太多，他也提到历史上的王莽，汉朝王莽王莽这个人，最喜欢改名字的了，他一当了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就我们现在不喜欢这个“长”呀！都要改了，他是统统改了，全国的长名，所有的长都统统改了，主席讲就派红卫兵把北京的街道都改了，都改了以后大家都不记得，还是记老名字，那末到王莽下诏书这个皇帝下命令都困难了，老百姓不知道这个长改什么名字了，下诏书怎么行呀，比如说咸阳县河南的现在的咸阳县，改成了记楼，诏书里就得写上诏阳即记楼，或记楼即咸阳，他就把老名字写在诏书里，这样就使得公文来往，就非常麻烦，比如花刷这种形式，外国人可以用，中国人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这主要经验是巴黎公社和苏维埃，主席这一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个阶级都可以用，如果我们被推翻了，资产阶级上台，他们也可以不改名，但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了，就象苏联呢？他们不改，还叫苏联共产党，还叫苏维埃共和国，他都不改，这样呢，主席就提出这就看他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谁掌权，这是根本的问题，不改名字，那就是咱们是不是稳当一点好，就要不改名字了，由于出了个问题，都想叫人民公社，各省、市都想叫，象上海一样也叫了，那主席就在最近一个时期反复考虑了这个问题，中央同志也反复考虑了这个问题，最初没有人这样想，这样一想，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那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主席说，那就发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改变政体问题，国家的政体问题，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呢？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任或者叫社长，就出了这个问题了，不但出了这个问题，还出了一个问题紧跟着，如果改，大家都改嘛，就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就发生了

一个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那就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所以这个问题呢主席说苏联就不承认，他不承认，承认会给苏联带来麻烦，怎么又出了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好办，资本主义国家倒可以承认，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主席又一再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那里呢？那么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委员里面有党员非党员，党委放在那里呢？他总要有个党嘛，要有一个核心嘛，那么不管叫什么，共产党也叫，叫社会民主党也叫，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要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啊，公社也要有个党啊，公社能不能代替党呢？所以毛主席说，看，还是不要改名字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的办法，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名字改来改去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呢？是不是还叫革命委员会，也给我们研究一个大学嘛，是不是还叫文革好，因为十六条规定了嘛，工厂里面他或者叫革命委员会，或者叫别的，象我们上海叫革命生产委员会，也叫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简单些叫革命委员会，工厂？三结合，这种联合也应该是三结合的应该是干部，包括技术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应该有工人，工人里面不但有青年工人，还有老年工人，还应该有民兵，就是说，名称主席的意见是原来宪法规定的一些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动不了，好！这样国务院也不必改名字了，市级还叫市人民委员会，也不要改了，毛主席说，上海人民很喜欢人民公社，很喜欢这个名字，怎么办啊？他要我们，是不是我们来商量一下，无非是几种办法吧！一个办法就是不改，上海还叫上海人民公社，不改，这个办法的好处呢，就是可以保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大家很喜

欢这个公社嘛，缺点呢那是全国只有你们一家，你们不是很孤立吗？现在就不能登人民日报，大家都要叫人民公社，中央如果承认上海人民公社，一登在人民日报上，大家都要说我要叫，为什么只准上海叫，不准我们叫，这样怎么办，那要有个办法，那就不改，不改有优点；第二个办法，我们就全国都改，全国都改就发生上面讲的一些，就要改变政体，改变国号，承认不承认很多麻烦事，这又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第三个办法就是改，就是上海改一下，这样就和全国一致了，当然你们也可以晚一点改，不是一定马上改，如果大家说还是不想改，那就叫一个时候吧，主席的基本思想怕挫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他说你们还是好好想一想看，又叫不挫伤上海人民的革命热情，又要搞到一个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你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毛主席对问题总是站得高，看得远，一个问题到了他那里，总要反复考虑的，他比我们考虑得细致得多，他想出了我们根本没想过的问题，包括我在内，同志们，我对这个问题连想都没想过，什么国号啊，什么承认不承认问题，根本没想过这，那个时候，大家主张搞公社，我们还觉得不错嘛，反正叫公社也可以，以后就干起来了，干起来就再来嘛，当然也报告了中央，我们那时就没有再往下想，有时脑子里转了一下，什么人叫公社社员嘛，农村里社员问题，农村人民公社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问题将来怎么解决，脑子里想过一下，但没有很好想下去，忙得不得了，就脑子里也有点热了，主席也考虑问题，的考虑，同时非常注意保护人民的革命热情，最后中央是在会议上讨论了主席的意见，同意了全国的名称临时权力机构的名称都不叫公社，当时中央文件特别加了一句，就是除上海中央另有指示外，就上海革命人民

有了一个余地，由上海人民自己考虑考虑，（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呼口号），所以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考虑得非常周到，非常细密，特别是对上海群众的热情，就是怕，我们临走的时候他还是问，你们看怎么样，能不能说得通啊，我们说上海人民嘛，总是听主席的话的，讲了大家都会听的（鼓掌呼口号），我们回来以后，就向公社委员会扩大会议传达了，大家一致的，没有发生任何争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那么就是中央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余地我们完全考虑了，考虑的结果还是跟全国一致，按毛主席的指示，改成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鼓掌呼口号），从今天的会议上，大家情绪来看，更加证明了，我们向主席说的话不是假话，我们相信全上海的革命群众组织，上海革命群众一定会同意把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鼓掌呼口号），现在有人造谣说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毛主席才不批准；也有人说，红革会没有参加，所以人民日报没有登，还有什么街上贴了七问八问、十问等等。现在请这些人把这些问题统统收回去（鼓掌呼口号），我们不过是改了一个名称，上海的政权、党权、财权，文权从旧市委、旧市人民委员会手里转到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这个事情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鼓掌呼口号），有一些人，他们在会上说，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理由是这个公社是少数人搞出来的，这一点，我说穿了，就是因为没有包括他在内，那我可以明确的表示我们的意见，这个口号“一切权力归人民公社”如同现在“一切权力归上海革命委员会”一样，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口号（鼓掌呼口号），因为这个口号的实际意义，他是把一切权力归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的上海人民，也就是说一切权力从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到我们自己手

里来了，这样的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政权是不会同任何一个人野心家、一个小集团分享政权的，只能是无产阶级的，他没有资格来讲话（鼓掌呼口号），那种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少数人搞出来的人，如果他不是别有用心，至少说也根本不懂得什么是“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是上海的无产阶级自下而上的，从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革命，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工人阶级不愧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不愧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英雄，他们冒着极大的困难，英勇地挑起革命和生产的重担，同志们，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的一月革命，我们还在想，实际上上海的夺权是从去年十二月下半年就开始了，那以我们的夺权也不等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和委员会才开始的，还是我们当时看到了铁路不通了，港口阻塞了，赤卫队要搞三停，这样的危险，而市委继续在搞经济主义的妖风，上海已经陷于瘫痪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夺权，同志们，不是说再一个月不夺权，如果一月初不发《告全市人民书》，不发《紧急通告》，那不要一个月，再要十天，上海就不可收拾，或者说我们收拾起来就更困难了，夺权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自下而上的夺了权，人民公社成立的时候，我们的夺权市一级的权，实际上已经拿到了，市委已经停止活动了嘛，事实上一月六日的大会就宣布不承认了，一月六日的大会宣布不承认曹荻秋是市长了吗？我们早已经夺了权了，而人民公社的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一月革命的成果从组织上由一个组织形式表达就是了，正因为这样子，他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所以党中央，特别是毛主席一看到这个现象，就发现了一个新事物，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毛主席发现的，才亲自批准了《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四个单位的贺电，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怎么能说是少数人搞出来的呢？还有的人说什么我搞出来的，谢谢你，我没那么大的本事，如果没有上海的千百万革命群众自己起来夺权，谁也打不了这样的局面，我们的同志有这个口号，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我说这是一个庄严的革命口号，他表示了我们有决心，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今天把名字改一下，那这并不是改变了我们的决心，我们还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鼓掌呼口号），有那么一小撮人，很少，就那么一小撮，他们搞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或者还没有说成那么更坏，甚至是被这种思想，被一个“私”字迷了心窍，这种人你们永远也不懂得什么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公社，如果还有谁想在人民公社改名字这个问题上做一点什么文章的话，我劝你们不要在这里打什么主意，这方面没有什么文章好做，在这方面做文章是不会有有什么好结果的（鼓掌呼口号），上面主要讲了一个夺权问题，下面的问题就比较简单了，第二个问题讲一下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因为这方面中央的文件很多，昨天报纸上已经发了告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这几天陆续发了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还发了小学、中学、文艺界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工作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关于机要保密档案的问题的文件，还发了很多很多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中央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讨论写出来的，象小学开学不开学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回上海以前，十二月分我们在北京就开过多次座谈会了，反复地征求意见，征求小学教员的意见，征求学生的意见，征求家长的意见，调查了几个月才下决心的，中学

也是这样，这些文件里面象红色工人什么这样的文件也是调查了很久，那么这些文件，我就不用在这里一个一个的解释了，因为都有文件发出来了，我们的任务是坚决执行，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执行，能不能贯彻这些问题，首先是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要下决心想尽一切办法来保证党中央的这些指示得到贯彻，这里边，因为今天大会出来的各个县，大家都来了，同志们，但毕竟大会的农民同志少，他们现在听广播，不在这个会场里边，到这个会场里的是这个城市里边的人比较多，我们希望全上海的同志，但当然首先是贫下中农同志，他们很好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抓革命，促生产，要保证我们今年农业上要有一个好的收成，同时，我们也希望城市的同志要从各个方面支援农业，因为农业是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晚了一天就要影响到收成，我们不管搞什么革命，离不开一条，包括今天到会的同志，我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都要吃饭，吃饭成了问题，别的事情就难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农业搞好，搞农业也好，搞工业也好，其他的问题也好，都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生产是上不去的，在这里，我想应该解决一个思想问题，那就是一讲抓革命、促生产，就把时间都放在革命，挤掉了生产的时间，而且用得很多，用的时间多，用的劳动力多，就好多基层组织大量的脱产，好多农村公社的群众组织，一个生产队人不多，但脱产的人很多，这个是不利的，搞不好的，林彪同志曾经讲过，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革命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时间的安排不能把革命放在第一位，而是要把生产放在第一位，一个工厂一天要八小时安排生产，否则的话，你这个生产就要打乱了，促生产就没有办法促了，商店不是八小时，农业它不是按八小时工作制的，特别是春耕大忙了，时间劳动力更加紧张，这个时候我们抓

革命就要按这样的情况来考虑，在这里我特别想对现在还留在城市的农村来的同志讲几句话，这里包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还有许多支援内地的工人同志，他们这些不是从农村来的是从内地来的，还有一些回乡支农的工人同志，还有到新疆去的青年同志，还有他们的家长，我希望你们很好地学习一下中央的几个文件，你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内地去，这个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光荣的，过去这样做，今后还要这样做，如果不把农村搞好，不把内地建设搞好，不把边疆建设好，我们上海建设得再好也没有用。关于上海今后的任务仍然还是要支援全国的农业，支援全国的农村，支援边疆支援内地，我们的生产是为全国服务的，我们的工业也是为全国内，我们同志们应该记得，柯庆施同志就是为了关心内地生产才带病到四川去的，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在那里去世的。他最后还是这样关心内地建设，那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继续这样呢？有些人现在抛弃自己原来工作岗位，跑到上海来要求报户口，要求重新安排工作，达不到目的就去斗斗里弄干部，斗工厂的干部，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是错误的，有些人吃了国家的饭，不为人民服务，在城市里干了些坏事，那更是错误，新疆兵团那里因为大量的人回到本地，回到上海来了，他们的农业生产已经受到影响，没有生产，我们曾经到一些长兴岛、崇明一些国营农场，因为一些青年同志跑回市内来了，家里的生产就完全停了，有的农场去年的稻子都没有收，一些棉花还在地里面，听了这些消息，非常痛心，上海有些学生同志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痛心，现在正有几千人跑去抢收了，那为什么现在原来应该在这些岗位上的同志，不应该回去呢？我们特别听到，在几个大饭店里听说和平饭店住了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里住着一些国营农场的工人，那么我们请问这些工人同志们，你

们住在和平饭店干什么？你们的岗位是在农场嘛！你们住在和平饭店，我说你们要学坏的，你们应当快点回去，而且你们中间，在上山下乡的青年中间或者其中从外地回到上海的人中间，我们知道，有那么一小撮是坏人，他们在那里不干好事，我们的青年同志，革命的工人同志都不要上他们的当，应该按中央的指示精神，回到自己光荣的岗位上去，现在春耕已经开始了，应该回去了，你们是有实际困难的，我们知道，但这些困难，应该按正常的办法来解决，决不能用这种做借口，就不回。一些从贵州回来的同志或者从四川回来的同志，我也知道，我在北京就看到一些电报，那时候贵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厉害，压迫过你们，那么现在不是改变了嘛，贵州成了一个先进的地方了吗？你们应该回去同那里的工人团结一致，闹革命，支持贵州的革命委员会，去进行夺权斗争，也不应该再留着了，不该再在上海留着了，有些人现在劳动纪律很不好，一听名义上说出来造反，而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反可造，逛大街玩，我这个话不是讲所有的人，而是讲一部分人，我也觉得，如果同志们你们真的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话，那就应该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因为这样懒懒散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革命造反派是在最困难的时候都顶上去的，应该向这些同志学习，回到生产岗位，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违背这个方针，也不能违背《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的规定，咱们赞成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意见，而对那些人，他们这样不顾劳动纪律，那就应该加以考虑，第一就应该教育，劝了还不回去，就应该停发工资，因为国家不能这样拿钱养人的，实在不行，应该开除，再这样下去，应该受法律处分，我们上海的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上海还是要往外动员人口的，所以想要在上海市内安排工作，不要抱这个希望，没有

什么希望，死了这条心吧！（鼓掌呼口号）所以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我不想多讲了，就讲这么一点，我把话说死一点，是为了我们，这样大家死了心，才好办事，才能回去。那么镇压反革命就用不到多讲了，我们上海这个地方同志们总还记得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上海不但有中国的地、富、反、坏、右，还有外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人数是不多的，就有那么一小撮，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他们，在战术上要重视他们，镇压反革命问题不能粗心大意，现在的情况很复杂，需要我们很好地观察，特别是我们广大的群众要擦亮眼睛，因为现在情况复杂性这是由于很多反革命，他们如果自己说我是反革命那就好办了，他不是，有些是打着造反的旗帜，有的是削尖了脑袋钻到造反组织内部来了，这一点我们全上海的革命同志都应该提高警惕性，我们镇压反革命的方针从来是毛主席的方针，这是要靠专门机关人民军队，靠公安局，靠专门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结合，就要有充分的群众路线，如果我们广大的革命群众起来了，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用什么方式活动，他们搞秘密活动也好，搞公开活动也好，我们就容易识破他们，这是一个，希望同志们提高警惕。

第二，希望我们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加强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地方的革命造反派要全力支持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同志们可以看到，我刚才讲了，我们的革命委员会，我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大的支柱是人民解放军，不但有陆军，而且有海军，这是我最强大的支柱（鼓掌呼口号）上海的陆海空军为了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支持革命造反派，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在这里代表革命委员会向上海陆海空军的指战员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感谢（鼓掌呼口号），同时我们向人民解放军的同志们保证，如果有人

攻击你们，如果有人想对你们采取那种冲击军事机关这样的行动，我们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人民解放军站在一起（鼓掌呼口号），那么，当然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有的地方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的指示，实行军事管制，但是那个地方有的组织，他们也说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有的我谈过话，以前谈过话，应该服从中央的命令，要实行军事管制就实行，但是那里的组织里面的，当然是很少的人不支持军事管制，甚至于把军事管制的命令划了叉叉，而且对军事代表围攻，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这些单位里犯过这些错误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是革命造反派的话，他们应该写出检讨，向军事代表赔礼道歉，如果他们不那样做，我们将要采取别的措施（鼓掌呼口号）……（接磁带）谣言造得越来越离奇，有些我看他们人也不多，是专门靠造谣吃饭的，有那么一位，是接管市委的，忽然发了总理的四点指示，我看了那个指示，我就奇怪，中央有什么四点指示，不会不告诉我们的，后来我们就打了电话到北京问，根本没有这件事，但是，可以假冒中央的名义，到处散发总理四点指示，问他的时候，他说：“不是总理的，是陈伯达同志的。”再问，又说不是伯达同志的，是从那里听来的，居然可以这样假充总理的名义到处去造谣，红革会的人也干那个事。另外说是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电报是假的，然后从北京又打来一个电话，说什么总理经过总参又告诉上海的红革会，又是总理四点指示，总理好象专门发四点指示的，说什么红革命是不对的，张春桥派兵也不对，各打五十板的样子，根本不是胡说八道，总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四点指示。

上海的红卫军发出两次特大喜报，一次特大喜报，是总理讲，毛主席、林彪同志讲：“复员转业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但是，总理说上海可以例外。”又一次特大喜报说是总理说，全国的红卫

军不好，只有上海的最好。这些东西根本我们一到上海，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都是谣言嘛！这次在北京开会的时候，我们是当着笑话给总理说了一下，大家笑了一场，关于这个彻头彻尾的造谣，毫无一点影子。还有一些谣言造到我身上，最近看到关于我的谣言，说得我简直没有办法，有一张传单，说我给三军的同志谈话，谈到工三司如何如何，我在这里负责声明，我和三军同志谈话多次，但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工三司，这个谣言多了，我们在北京，突然，国务院接待站打来一个电话，说上海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的代表来告状，告上海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告王洪文、潘国平和我，而且说上海那天有五十万工人游行。你们在上海，你们知道那一天有五十万工人游行？不过是一百多辆汽车。这两天又有什么好几个离奇的电话，又说王力同志分析上海形势有五点指示，我算一算时间，我们那时正在北京，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事，我不去问王力，也用不着问这些事。还有说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答复的说什么上海人民公社如何，所以中央不承认。我在这里说一句就行了，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根本没有一个接待站，什么中央文革接待站在工人劳动文化宫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他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的文化革命接待站。文化革命小组没有接待站。我昨天看了一个消息，说什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联络站，还有个什么几点指示，更是胡说八道，那里有这个东西，连个接待站都没有，怎么在那里听了五点指示，我看你真是碰了鬼啦！为什么有些人就靠这个，北京有个什么消息到上海街上一贴，谁也不能辟谣。我们实在是不愿辟谣，不值得辟谣。如果要辟谣，那很简单，你以为你可以造谣，我们就不能给总理打个电话问一问吗？那个样子造谣法，这样的人再造谣，小心一些，想假冒国家政府首脑的名义

要负法律责任的。（鼓掌呼口号）我们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有理你就摆出来，不要搞谣言，靠谣言吃饭是吃不饱的。有道理你来讲嘛！至于红革会那些头头们，你有道理完全可以讲嘛，不要靠造谣。我们相信红革会的战士们是要革命的。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红革会的战士曾经给我们打电话，要求说他们要开请罪大会，要我们参加，我就说，你们战士没有罪，请什么罪呀！红革会的战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一小撮头头。（鼓掌）就是对那些头头，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真正改正错误，我们并不准备一棍子打死。但是，要采取老实态度，不能采取蒙混的办法，或者故意挑动红革会战士们，使战士们继续上你们的当。我们还是一月二十九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电报的态度，我们支持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我们欢迎红革会的战士们造反。（鼓掌）现在还有那么一股风，故意挑动我们革命干部子女、军队干部子女的感情，我看到一个什么叫做革干、军干子弟联合战斗兵团的传单，这是一张反动的传单，是他们故意挑动军干、革干子女，说现在社会上到处都在斗你们的父母，真是胡说八道，我们革命干部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我们的军队干部更是绝大多数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军干、革干子弟绝大多数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这些孩子是党的、是人民的、是毛主席的！（鼓掌高呼口号）他们即使有一些缺点、有一些错误，是可以改变的，你们想挑动他们的感情，把他们拉到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去，去搞什么“联动”啊！你们是得不了逞的，我们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很好的对待这些青年同志，因为他们是党的，是不会一直跟着他们的父母走的，他们是会跟着党走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做他们的工作，这样才能使“联动”这样反动组织不能在上海扩大活动。最后我想说一下整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

风。这个问题就不准备多说了。我讲的时间也相当长了，现在我们需要为了执行主席的指示，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到底，那我们需要把革命造反派的组织能够加以整顿，特别是要从思想上加以提高，上海的革命造反派为上海人民、为全国人民建立了功劳，这是看得见的，抹煞不了的。但是也看到我们有许多问题，我这里讲的是革命造反派的组织，不是讲的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我们队伍也有不纯洁的，有的需要清理一下，同时我们建议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现在有些组织需要考虑按照单位、按照产业、按照系统、按照地区加以调整。因为有些革命组织是跨行业的很多，它又是工人组织，它又有农民，又有机关干部，又有学生，又有文艺工作者，很杂。有的以学生为主，吸收了别的，有的以工人为主，吸收了别的，这样子不好，还是按照产业来组织好。同时不按照单位来组织也有问题，大家搞得都在上面，混进了坏人也不知道。如果在本单位组织，这就比较好，坏人不大容易钻进来。同时从整个斗争，从其他，特别从斗批改这个要求来看，按系统来搞比较适宜。你比如说纺织系统的工人组织，如果他们实行一个大联合，或者冶金系统实行大联合，那么，他们在批判，在斗批改，纺织系统的问题或者冶金系统的问题，那就比较方便。这个问题是个建议，请同志们加以考虑。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好多组织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用民主的办法解决，用协商的办法解决。现在有些办法，有许多行规的组织，有的是专门搞经济斗争的组织，那实际上是分裂了工人阶级，甚至有的按年龄，那个东西怎么能够造反呢？比如说，一九五六年大学毕业生一个造反司令部，我就劝这样的同志考虑一下，那个一九五六年也好、一九五七年也好、一九六五年也好，不管那一年，反正你那一年里面总之有左中右吧，有两个阶级吧，你们那一年都是左派，

都是革命派？我不相信。我们要搞，都是按阶级，按左中右来搞。我们是革命造反派，我们就要革命造反派的组织，怎么能按年分呢？五八年，你不管那一年的年分再好，四九年的年分也很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那也不能够划分阶级，有些队名，那个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什么，是搞经济斗争的，还有些特殊的单位，那天，我听人家说什么东西呀，不是一些公墓啊，一些坟啊，被挖了吗？当然这个事情应该解决囉！被挖的这些人，那么就组织了一个造反司令部，我也不知道他们造什么反，又要经费，又要刻图章，又要搞什么，这就是不成了一个什么革命造反组织嘛！现在有些组织不能够承认的，不应该组织的，我们希望他们最好自己自动解散，有些机构脱产人员太多，刚才我讲要加以解决，将来逐步的做到巴黎公社原则来选举。有一些组织在市內名气很大，里面没几个人，但是又要房子，又要汽车，这些人我还是希望他们回到原来的岗位，去好好的生产，好好的革命，你如果能够把你那个单位真正搞好了，我看就不错了，咱们现在还有好多单位的权没有夺下来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说一下，要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够借口忙，不看书。这个旧市委有一些领导人，我说不讲别的，就这一点，那非犯错误不行，就是不学习，要想学习毛主席著作，那就真是难了，什么规定星期六要学习的，到那时一个人也找不到，这个东西要靠自觉，我们同志们要知道《红旗》杂志第三期有一句话，希望有一些人不要成为曇花一现的人物。我希望我们在坐的同志们，很好的想一想这句话。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了一批人，当然，总数不是很多，包括在北京也有，外地也有，我们都是很欣赏的几个人，这几个人真是不错，在文化革命里面很有才干，但是最近都犯了比较大的错误，这句话就是对这些人讲的。在坐的同志们，我们自己有没有可

能啊，有没有可能当刚刚取得一点胜利却冲昏了头脑。原来个人主义就有，但是这时个人主义突然大发展，有可能的唯一办法就是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要很好的读毛主席的书，不但只是在开会的时候唸几段语录，真正要学会主席的思想，语录要读，主席的一些主要的著作要读，特别是已经当了权。同志们，你们中间的很多人过去不是当权派，现在夺了权，自己是当权派了，究竟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啊？这个问题我们面临着考验，如果我们当了权，我们跟着毛主席走，真的把主席的书把我们头脑里不好的东西，经常的不断的作斗争，那我们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当权派，如果我们头脑里面资产阶级的东西发展了，那么，我们也可能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就要被打倒。那个时候就有另外一批人或者就是在坐的一部分同志起来要打倒我们，这句话我想在今天我们很高兴的时候，讲一讲这句话有好处，为了使得大家不 被打倒，因此先要想到被打倒！（呼口号）

我们要在学习这一点上，要很好的向毛主席学习，毛主席现在一天他化在读书、看报上的时间，那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全国红卫兵的报纸，他现在都要，而且他都在看。各种传单他都要，每天秘书都是送来一大堆报纸和传单。他为什么要了解那么多情况呢？很多的情况是从这里了解的。他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讲，也给我们讲：“你们不管怎么忙，你们最好一天拿四小时读书看报。”同志们，在坐的同志们，你们能不能拿两小时？同志们，我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我们各个革命造反派，我们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我们有信心，不管阶级敌人多么猖狂，他们是打不倒我们的。但是堡垒是容易从内部突破的，如果我们自己搞不好，如果我们不是坚决的、完全的按毛主席的指示做。如果我们不是经常的不断的学

主席的著作，认真的改造我们的世界观，那么可能坏事就坏在我们自己手里。所以我在结束我的讲话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敌人是打不倒我们的；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一定要很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有最强大的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上海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够在毛主席的关怀之下，在党中央的指示之下，取得更伟大的胜利！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祝同志们在工作中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张春桥同志在二月二十四日的大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仅供内部参考，不得张贴，不得外传。）

复 旦 < 鏖战急 >
毛 泽 东 主 义 兵 团
上 无 九 厂 工 人 革 命 造 反 队

} 整理

华东局机关 < 卫东彪 > 革命造反派
士兵革命委员会

} 打印

华东局机关 理论班革命造反派
红宣兵革命造反派

} 翻印